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信仰的力量

流动的时间,凝固成历史。在水口镇不断建起的新楼群里,叶家祠依然守护着自己的一方宁静。6名战士宣誓的阁楼还在,登上阁楼的木梯还在,放置油灯的四方小桌还在。伫立于此,耳畔仿佛又传来当年那铿锵有力的誓言。墙上斑驳的解说词告诉我们,这6名战士中,有两人后来成为战功赫赫的开国将领。

看着阁楼桌上的马灯,默读着入党誓词,我思绪感奋,心潮起伏。走进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清醒地知道从哪来,才能明白坚定地往何处去。井冈山时期,这里没有荣华富贵,有的只是恶劣的环境和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而无数革命者却如激流入海般汇集。像磁石般吸引他们的,是远大而崇高的理想。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什么毁家纾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率领万千民众赤手托起即将沉沦的中华大地?因为他们坚信,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必有胜利的一天。也许他们自己看不到那一天,但他们都怀着必胜的信念,为那一天而奋斗。有了如此笃定的信仰,他们在那艰难困苦岁月中才充满了智慧和勇气,才会绝路逢生、创造奇迹。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段论述高度肯定了水口党建工作的重大意义,同了人民军队的胜利之路和力量之源。因为有了党的组织建设,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在红军官兵中的影响得以有效确立,为信仰信念敢于牺牲的精神力量得以迸发。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坚定信仰是最重要的党性修养。这既是我们党和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起家本钱”,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必须长期坚持的“看家本领”和“传家宝”。

风雨沧桑,冲不尽历史印迹;行程万里,忘不了苦难辉煌。今天,我军的组织建设已经健全而又成熟,但信仰信念弱化的问题不容忽视,遇到的挑战同样巨大。水口解决的是没有组织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信仰信念是否得到坚守的问题。只有坚守之,方能铸就强军魂,托举中国梦。这也是这座祠堂告诉后人的真理。

时揭示

这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项创举。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党组织,连队立刻有了灵魂。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将“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为党建建军的一条重要原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找到了有效途径。

在叶家祠主持连队建党后不久,毛泽东审时度势,最终做出了不去湘南而上井冈的历史性决断。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历程由此发轫。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以后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我当时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毛主席亲自主持6名士兵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旧址

►炎陵水口叶家祠外景

叶家祠的回声

褚振江

并不久远的往事

如果不是讲解员的介绍,也许很少有人会知道,我眼前这座青砖黛瓦的江南祠堂——叶家祠,便是我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旧址。

它坐落在井冈山西麓的炎陵县水口镇,是一座典型的晚清江南祠堂建筑,砖木结构,气势宏伟,古朴庄严。其门楣匾额“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连队建党旧址”,是1976年赖毅将军重返叶家祠时亲笔题写。党的生日前夕,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这里。

时间的刻刀,在历史之壁雕凿。九十多年前,这个深山小村,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荣耀、最可爱的一支队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

桥头江家,是水口镇水口村江家组的一座小院落,与叶家祠隔河相望。院落的门前,河水缓缓流淌,河边种有两棵高大的乌桕树。院落右侧,还有棵千年古松。

1927年10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其住地桥头江家,召开了各连党代表会议。会议在各代表提名的基础上,讨论通过了6名新党员。他们是陈士渠、欧阳健、李恒、赖毅、鄢辉、刘炎。会后,党代表通知新党员晚上在叶家祠开会。

当晚,小阁楼里一灯如炬。祠堂靠北墙边放着一张四方桌,桌上放着一盏小油灯,灯下压着两张红纸:一张写着“C·C·P”3个英文字母(英文“中国共产党”的缩写),另一张写着入党誓词。灯光下,一名身材瘦高的30多岁男子,庄重地举起右拳。在他的对面,6个年轻人也跟着举起拳头。随着高个子的声音,几个年轻人也随着举起拳头。随着高个子的声音,几个年轻人也跟着举起拳头。随着高个子的声音,几个年轻人也跟着举起拳头。随着高个子的声音,几个年轻人也跟着举起拳头。

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就在这星夜温暖的灯光里,一件和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大事正在发生——这个简单而庄严的仪式结束后,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诞生了!那个引导宣誓的人,正是刚刚领导了秋

收起的毛泽东。由于进攻长沙失利,毛泽东果断作出决定,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湘赣边界农村转移。南昌起义成功之后,由于只是在团一级建立了党支部,导致党的支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使得工农革命军政治上不巩固,经不起残酷战争的考验。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党开始着手加强对军队的领导。

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但由于行军打仗,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施,直至部队来到水口。

水口建党,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付诸实践:班、排设党小组,团、营建立党支部,全军由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连一级,党代表由党的支部书记担任。支部建在连上,使得部队基层单位直接处于党的领导之下,避免了领导上的断层现象。同时小组设在班排,与士兵群众直接联系,因而使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水口建党,对党员要求非常严格,发展的都是军政兼优的同志,不仅为部队增添了党的新鲜血液,加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士兵基础,而且为初创时期红军党的建设摸索积累了经验。



这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一项创举。有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党组织,连队立刻有了灵魂。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古田会议,将“支部建在连上”确定为党建建军的一条重要原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找到了有效途径。

在叶家祠主持连队建党后不久,毛泽东审时度势,最终做出了不去湘南而上井冈的历史性决断。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历程由此发轫。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以后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我当时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 淮军悍将

“郭松林来沪,正值紧急之际,鸿章知其打仗奋勇,因调沪中旧营,令其训练五百人,求公赏借,勿苛责之,鸿章当时时感其过。”

这是李鸿章向曾国荃借调郭松林的复函,时在同治元年(1862年)三四月间。其实,早在当年的二月份,郭松林就到上海跟李鸿章搭上了线,彼时,曾国荃部已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团团围住,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在江、浙一带扫平外围太平军,以确保包围天京的曾国荃部的侧翼安全。明眼人都看得出,攻破天京的首功肯定要归于曾国荃部,身在军中的郭松林虽然已因功擢升参将,但相比同期入伍的李臣典、朱洪章、彭毓橘等人,仍有一定差距,且与主帅曾国荃多有龃龉,自幼聪颖的郭松林知道,假使真的克服天京,自己会有一定的功绩,但不会太大,肯定不如备受曾国荃青睐的李臣典等人,而李鸿章的淮军初组建,自己过去,就是创军元老,前程未可限量。巧合的是,此时的李鸿章正求贤若渴,郭松林的悍勇亦早有所闻,二者一拍即合,遂定下了郭松林入淮军效命的计划,李鸿章复函中所言“时时感其过”当也是替郭松林向曾国荃的宽宥之言。

事实证明,郭松林这步棋走对了,彼时淮军初创,除了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就数郭松林的带兵经验最丰富,日后威名赫赫的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彼时都是新兵蛋子,当不得大用。首战上海,郭松林与程学启充当先锋,与李秀成、谭绍元兵团连续交锋,“破贼众十万”,又有常熟之战,郭松林再次爆发威力,第一个杀入敌阵,“大破三河口贼营,贼争道,六浮桥尽断,尸塞河,水为不流”;紧接着又有浙西之战,“克长兴,复湖州,功皆最”。资历老,能力强,立功又多,转投淮军的郭松林如鱼得水,官阶也越升越高,到太平军被完全剿灭,郭松林已是实授福山镇总兵并记名提督的一方军政大员。

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担任“剿捻”主帅,淮军唱主角,湘军则成为替补,郭松林继续大展拳脚。当年12月,郭松林率军追击捻军赖文光部,先克宣城、云梦,又下阜河、杨泽,追至白口(现属湖北省钟祥市),遭捻军伏击,“松林伤足,卧地不能起,将卒不见松林,复闯入阵,负而出之。”是战极其惨烈,郭松林所部4000余人几乎伤亡殆尽,郭之四弟郭芳珍阵亡,还亏得以前在曾国荃部下时的老朋友彭毓橘率军来援,肉搏近战,拼死撕破防线,才将郭松林等救出。

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平定,戎马多年的郭松林获赐黄马褂、子轻车都尉世职,并授湖北提督,驻防襄阳。湖北白口落下的伤病!郭松林病逝后,清政府予谥“武壮”,事迹直付史馆立传,原籍湖南及江苏、福建、山东立功省份均建立专祠祭祀,可谓极哀荣。

时光荏苒,眨眼百多年过去,各地武壮祠早已不存,即连湾村中的郭松林墓也早已毁去,当年湾村中的浪荡子从军而成一方大员并光耀门楣的励志故事也只能从散落手史籍和地方志中拼凑出些许碎片。所幸,郭氏后人并非有出息,郭松林子郭人漳,以世荫得道员,历任山西道台、江西和两广巡防营统领等职,并与革命党人黄兴、赵声等往有来。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与齐白石往来颇勤,一定程度上也为齐白石的扬名京师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 身后哀荣

郭松林任湖北提督,归家省亲,郭母每每感曰:“我妇人,犹知古义在公忘私,今后无以我为念”;郭氏任官仁贤,多得民心,“凡行惠及人,必自告太夫人”;郭母病重期间,“襄阳士民奔走祈禱,若忧其亲,其卒闻皆哭”等句……虽然墓志铭多溢美之词,也总不会是空穴来风,总有所本的。

光绪六年(1880年),郭松林由湖北提督任上调直隶古北口提督,是时清廷有“海防”、“塞防”之争,时为直隶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是“海防”派代表,忧心海上敌寇,想到了淮军初创期间的左臂右膀,便将之调到直隶,以备抵御列强。可惜天不假年,调任直隶提督未逾月,便歿于任上,按《湘潭县志》的说法,则是“不乐荒寒,又前伤足失血,多有未疾……”看来,还是十多年前的



李鸿章题郭母夫人墓联碑(资料图)

碑刻档案

碑名:郭母夫人墓联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150厘米、宽46厘米、厚20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民间收藏爱好者家中

碑刻里的株洲

见证晚清提督郭松林的发迹史

天元区雷打石镇脉湾村发现的墓碑挽联

◆ 浪荡子从军记

车行在新建成的湘江大道,车少路宽,一路向南,不过十余分钟便开到,自辅道右拐向一条相对逼仄的硬化水泥路,再行十来分钟,便进入雷打石镇脉湾村的行政辖区内。眼前屋舍俨然,疏篱院落,菜色青碧,好一派美的江南田园风光,百余年前显赫的郭家门庭,在时光的淘洗下已难觅其迹,不过也留有蛛丝马迹,譬如,脉湾村中,郭姓者颇多,且大多晓得祖上出过大大人物,甚至,离村委不远的一片小山坡就被命名为郭家坡。

郭家坡便是2016年发现那方郭母罗太夫人墓碑的所在,据村中人言,这里以前便是郭氏义田,也便是墓碑下联中所谓“贍族有义田遗意”中的义田,该下联言郭母以郭氏义田贍养亲族并得赐赐褒奖的义举,至于上联所言“教子以报国忠忱,百战威声光竹帛”,则是直抒郭松林的赫赫武功,也是郭氏一门兴旺发达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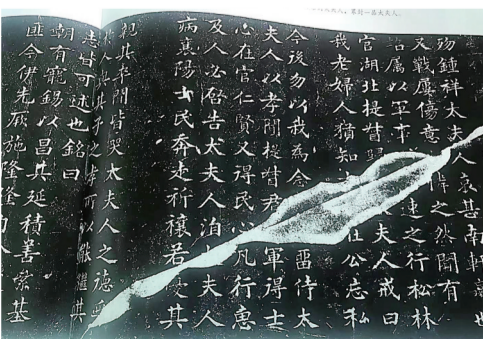
据《湘潭县志》并《郭氏族谱》言,郭松林,字西堂,号子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生,父名玉阶,曾封赠登仕佐郎,这是个从九品散官,非实职,一般通过封赠获得,也可捐资纳得,再结合墓碑所言义田贍养亲族之事,可见,彼时的郭家算是当地饶有家财的富户。史载郭松林“相貌奇伟,双眉插鬓”,且自幼聪颖。身为郭家长子的他却生就一副浪荡性子,用其父郭玉阶的话来说就是“不事农儒,跌宕乡里”,既不好好读书,也不好种地。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荃奉曾国藩之命,回乡募集3000人马以救援被困江西的曾国藩,时年23岁的郭松林应征入伍,随曾国荃等一并赴江西驰援。首战安福,从剿永新、太和、万安、莲花厅、龙泉等地,在乡间浪荡无行的郭松林却在作战中异常勇猛,尤其是在次年的围攻吉安之战中,石达开率数万兵马来战,郭松林率先冲入敌阵,与太平军肉搏,杀敌无数。《清史稿》载:“松林首陷降,多斩获,收复新喻、峡江、吉水。”郭松林也因战功被擢升为守备。

随后数年,郭松林一直随曾国荃部转战南北,首围安庆,“剿陈玉成于小池驿,进壁集贤关,每战皆捷”,再克安庆,“擢游击,赐号奋勇巴图鲁”,又“克庐江,无为、运漕镇,下沿江要隘,擢参将。”直到一纸调令将郭松林从曾国荃军中调至新组建的淮军之中。



郭母罗太夫人墓志铭拓印(部分)(鲁新民拓印)



李鸿章题郭母夫人墓联拓印(鲁新民拓印)